

# 中國古外銷陶瓷 研究資料

第一輯



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会 編印

1981.6



---

新安海域发现的中国元代沉船·····	约翰·艾尔斯(1)
新安古沉船之航路及其有关问题·····	尹武炳(3)
新安海域陶瓷器编年考察·····	郑良谟(6)
南朝鲜出土的宋元瓷器·····	崔淳雨(10)
木浦沉船发现的中国瓷器 —— 福州输出的早期元瓷研究·····	陈庆光(12)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瓷器 —— 与新安海域发现瓷器之比较·····	董依华(15)
日本的宋元陶瓷·····	长谷布乐尔(18)
宋元贸易陶瓷·····	三上次男(21)
日本传世的砧青瓷·····	长谷布乐尔(22)
日本日出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	东京国立博物馆(25)
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及其他·····	陈台民(31)
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	艾迪斯(35)
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瓷·····	富斯(48)
中菲贸易关系上的中国外销瓷·····	费·兰达·约卡诺(58)
东南亚的东方陶瓷贸易·····	魏约翰(61)
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	苏莱曼(68)
编 后·····	(76)

---

# 新安海域发现的中国元代沉船

(英国)约翰·艾尔斯

据报告，一年左右以前，在朝鲜西南海域发现了一只沉船，这是一次头等重要的考古学发现。船货中包括许多元代的或比元代更早的中国陶瓷器。这只船沉没在朝鲜全罗南道靠近新安的道德岛附近。根据渔民们发现的一些青瓷器线索，朝鲜文物管理局决定对这只沉船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已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开始打捞。水下的条件极其困难，厚厚的污泥使得一切都看不清楚，危险的水流和严寒更为朝鲜海军潜水员增加了障碍。尽管如此，但其结果却非常引人注意，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的特殊价值。第一次调查就重新发现了二千余件器物，其中主要是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尽管被长期浸泡，但大部分未碎，完整无损。除瓷器外还有青铜器、石器、漆器和许多铜币。

很清楚，打捞的器物只不过是沉船物品中的一小部分，需要进一步制定计划。于是，有经验的美国海底考古学家唐纳德·A·基斯先生的建议得到采纳。当发掘工作于一九七七年六月重新开始时，使用了比较严格的科学方法，包括在沉船失事的整个地区投下铁网。结果，去年又发现了四千七百三十二件器物，包括各种常用瓷器和大量的铜币。这些器物主要是从船舱中弄出来的。这只船约二十尺宽，上层结构实际上已被水生物而且无疑还有渔网所侵蚀。然而现在，似乎船中的物品也只发掘出一部分，但是从迄今已有的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来说，已经可以确定这次发现使我们对中国陶瓷史的知识大大增加了。

这些调查的结果，通过一九七七年十月在汉城朝鲜国立中央博物馆展出的、经过选择的几百件物品中反映出来，并附有一份精致的插图目录。与此同时，由朝鲜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崔淳雨先生主持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应邀参加的有日本、台湾、美国、英国和朝鲜等国的代表，就新安海底遗物发现的意义和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紧紧围绕着诸如沉船的国籍、船的预定路线和航海目的，船遇难的日期以及船中的货物等问题。

对于陶瓷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至于沉船本身今后的方针——是否能够或应该全部打捞，如果这样，怎么办——也被考虑到了。

航海史专家和贸易专家们认为这只沉船是中国的，而且可以确定是在从中国开往日本的途中遇难的。它可能从南京或杭州地区的一个港口出发，中途由于狂风巨浪的原因驶往这些岛屿间寻找避风港，而这些岛屿正好离当时商人们通常驶往博多港（日本九州福冈）去的航路不远。船货中出现的三件十二世纪的朝鲜刻花或镶嵌青瓷，特别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瓷器的编年判断看来几乎不可能有重大的误差了。既然如此，就不能确定这只船访问过一个朝鲜港口的必然性，——虽然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古物在其它地方也可以得到。另一方面，一大舱六千五百件中国瓷器这个惊人的数字只能是商业批售，其日期接近于

该船遇难的时间；而根据目前的意见，船上全部物品有理由断定是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的东西。

幸好还保留下一些可靠的检验物，可用以比较准确地断定主要船货的年代。例如在发现的大量铜币中，年代最近的是至大（一三〇八至一三一—）通宝，是一三一〇至一三一一年第一次发行的；这样就提供了一个无可置疑的时间，确定了这次航海的时间是元代中期；更详细的证据是没有发现青花瓷，但有相当数量的青白瓷和枢府瓷。我们知道，青白瓷和枢府瓷或者与青花瓷同一时期，或先于早期画瓷；因此，可以有充分根据断定该船遇难的时间约在一三一〇年至一三二五年之间，也许更接近于后者。当然，这儿有一份充分准确的现代资料可用以检验一下这种观点的任何有效性。

一份简单的陶瓷发现物的记录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青瓷三千四百件，白瓷（主要是青白瓷和枢府瓷）二千二百八十件，其它包括建窑、吉州窑及少数别的瓷器七百七十件。这些瓷器的质量比较高，尤其是青瓷，似乎全是浙江的，也包括在东南亚常见的福建或者广东的各种瓷器，而白瓷是江西出产的，但没有德化白瓷。典型的元代青瓷中包括许多各种规格的盘子和碗，往往是十件一套。“近东型”的精致园边盘子，直径约十五寸左右，通常刻有涡旋饰纹和弦纹（在容器口边或外壁），并且可以同任何的莲花题材连接起来，等等，盘子中心雕刻印文、龙或双鱼；口边淡素或带托座叶饰，也有制作结实的直罗纹边的罐子，二至十二寸高，有平盖或莲叶盖，比较大的十八时的栏杆柱形瓶，罗纹喇叭颈，花瓣边足，中心为穿枝莲。甚至还有一个超过二呎高的刻花瓶子，很象戴维基金会收藏的那件一千三百二十七年的供瓶。

许多青瓷器与近几年在菲律宾发现的很类似。有很多仿宋莲瓣碗盘，有的是小足口沿内折；也有一些敛口青釉小碗、素园锥碗和多瓣花杯，大部分是高质量的，很可能是著名龙泉窑瓷器。其它的具有元代精足特点，往往刻有浅淡莲花纹的瓷器，看来有一种大量生产的气势，其产量一般都很惊人。香炉有各种式样而且质量好，有许多中小园柱形的，也有三角刻纹或涂饰花枝或牡丹花枝的大香炉，而其它如球状或八角形者则绝无仅有。花瓶和乳钉“球茎碗”，药用研钵，香料小瓶和各种奇特式样的水注等，据说在日本，这些器物如同梅瓶、瓶、壶、高脚杯以及一些带有这一时期特点的牡丹环柄瓶一样有各种用途。特别吸引人的是高式香炉和鱼柄或凤凰柄式花瓶，还有少量其它东西，——例如五管壶——共有二十五件，其风格和质量同宋代瓷器更为相近，人们也许怀疑这种传统特性并非惯常所见的成对形式，至于香炉，倒有一些；但无论如何，对此应持某些疑意。

一些其它式样的器式需要谈一下，例如有两个或更多的官窑青釉碎纹小香炉，也许质量不高，但可能是龙泉窑的；还有一个漂亮的盘子和一个匱，二者都有铁褐色的荞麦青瓷斑点，前者的中心是棕褐色的玫瑰花饰；最后，有一个九寸高的残损座佛像。

白瓷的式样较少，或许只代表少数几个窑，其属于元代时期这一点一般都很清楚。其精致的青白瓷有梅瓶、素纹瓶、或龙花环带、侧耳瓶，都是成对地出现，而单个出现的则属于元代彩罐、长嘴水罐有素纹和刻工两种，还有规格较小的素柄或龙柄葫芦形、枢府窑式茶碟和深边小碟是一种标准形式，有印花莲龙图案，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同更簿的“青白”型结合在一起；但是，有许多青白瓷，主要是印花或素纹的碗盘，边口往往烧有金属线，但现已脱落。一些精致的高脚杯，其式样早于十五世纪初期，另外一件器物是一个莲叶枕，一少女斜依其上，是宋代的风格，但其质量并不是预期的那样好。其它一般式样的有定窑风格的乳白印花大盘，以及一些光滑的“蛋壳”釉白炆器，暂称为“临川窑”，即《陶录》里所提到的江西的一个窑。

与吉州窑有关的是一些彩绘炆器：一个“钉饰涡纹”底小瓶，一些大胆制作的磁州风格的龙或花纹罐；还有少数珐瑯瓷人。在褐釉瓷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建窑的茶碗，不知它们是为日本的品茶者制造的还是仍然保留着原来制作时的同样形式？也有一些吸引人的花盆和钧釉盆，估计这些器式是产自苏州或宜兴地区的。

青铜器并非不引人注目，而是这一时期的发现物不多。这些青铜器主要是祭祀用的，有时带有古时的刻工，尽管和平常的铜器不一样，但还完整地保留着，其他器式有灯、炊具、盆和一面镜子；也有两件银器，一个是杯子，一个是透纹碟。最后的但也不是最无价值的，是一个保护很好的牡丹剔红小罐和一套黑红漆盘。

据说，这次调查还不完全，另一次研究打算在一九七八年进行，因此，仍有进一步探索的余地，而且沉船失事的时间可能予以确定。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

## 新安古沉船之航路及其有关问题

南朝鲜忠南大学教授 尹武炳

### (一)

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在高丽时代最为活跃。高丽朝代早期，契丹在朝鲜半岛北部扩张势力，致使朝鲜和中国本土之间的陆上交通遭到困难。就在这一时期，宋代商人从中国中部和南部沿岸的贸易港口进行投机生意者日渐增多，许多商人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

到了宋代末年，中国商船来至朝鲜者益趋频繁，开城市内居住的中国商人多至数百名，据当时一位中国使者所写的《高丽图经》记载，在开城居住的中国商人大部分来自华南的福建省。

据高丽历史和宋代文献记载，当时朝中两国之间有两条航路可以利用，一条是北路，一条是南路。从历史上看，北路的开拓时间更早，在高丽时代之前即已使用。

隋唐海军远征舰队入侵高句丽时，从山东半岛莱州出发，经由大同江口直逼平壤。这一航线相当于北路。新罗末年，许多新罗人沿着这条北路去到中国，当时他们就集中定居在山东登州附近的江苏北部沿岸。

不但新罗人沿着北路去中国，而且日本人也利用北路同唐代进行交往，日本遣往唐朝的使节从博多港(福岗)出发，沿朝鲜西海岸航行，然后再沿北路抵达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了许多有关日本使臣和留学生乘坐新罗船往返唐朝的事实。

## (二)

另一方面，南路在十一世纪后半期才成为普通的航道，考虑到同契丹的关系，高丽朝要求此路通过浙江的明州(宁波)入宋，宋朝应允(神宗熙宁七年)。

为了便利往返的高丽使节，宋朝在长江下游北岸的扬州为他们建筑了一所高丽宾馆(公元一〇八四年)。从高丽来访的人抵达明州后即可取道扬州通过运河前往宋代都城开封。自从宋代都城于一一二七年南迁之后，南路就成了一条更为方便的航道。

仁宗天圣元年(公元一〇二三年)徐兢奉使高丽，他在其《高丽图经》一书中对南路的地理情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徐兢离开杭州湾头的明州经过舟山列岛转向东北，顺风行驶至黑山岛近海，沿着西海岸北上，直到开城外港礼成江口。他返回中国时仍然沿着这条航路行驶。

徐兢在沿西海岸的航行过程中，经过竹岛、苦苦苦(窟岛)、古群山岛、马岛、(安兴)、紫燕岛(永宗岛)和蛤窟(江华甲申)。我们知道竹岛是徐氏顺道访问的第一个岛，紧靠新安遗迹，但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可能确定竹岛现在的情况。

根据我的推测，竹岛就是现在全罗南道灵光郡附近的鞍马岛、蝟岛和古群山岛都是全罗道西南沿海的主要岛屿，是良好的抛锚地。鞍马岛位于新安古商船遗迹发现地西北北约三十五公里的地方。

徐兢一行所乘之船，构造坚固，船体底部呈刀口状，可以划破波涛疾驶前进，据徐氏记载，船队在去朝鲜的航程中趁南风之便，归航时趁北风之便；夜间航行时看天空的星星，天阴时靠指南针。另据徐氏记载，汉代已经发明了指南针，宋代在航海中就使用了指南针。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中国人造船和航海的技术知识就已经很先进了。

## (三)

徐兢的《高丽图经》指出，水手们凭借着季节风往返于朝鲜和华南之间。《高丽国历史》中有关宋商来航记事中写道，他们于阴历七、八月间趁西南季节风而来，我们也可以推断，他们等到十一月以后的北季节风时再返航。

由于徐兢一行趁南风之便，顺风行驶，因此从舟山列岛的梅岭驶抵黑山岛近海只用了五天的时间，抵达古群山岛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归途中碰上了逆风，花费了许多时日才驶进古群山岛，回到舟山列岛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

船队在归途中在黄水洋的沙尾触礁搁浅，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有的帆船遭到破坏。黄水洋好象就是今天的黄海。徐兢所描述的沙尾(洋中沙堆)在黄河入海口延伸有百余里或数百哩之长，他还写道，从明州出发的航海者必须经过沙尾，但是从北部登州出发的人却可以避开这一沙礁，据说水手们还举行了慰灵祭礼，用铅锤探测水的深度，小心谨慎地脱离了这一险境。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推测黄水洋或黄海古时候在朝中两国水路交通间形成一大障碍，似乎是取道南路的船只必须沿着黄海南部外围航行，也就是说，必须沿着黄海和东中国海之间的边界线航行，徐兢把这一部分海域看作是白水洋。因此，我们可以把握地推测黄海中的沙尾是考察南北两路分开的理由之一，二者均避开了黄海。

## (四)

宋元两代，明州是中日航路的基点，横越东中国海，经过五岛列岛，抵达博多港，这条航路在晚唐时期已为日本遣唐使船所沿用，大多数船只均悲惨遇难。但是由于同新罗的关系恶化日本使节非得沿用这条危险的航道不可。因为害怕新罗海盗的专横跋扈，日本甚至被迫中断了

遣唐使船。因此，自九世纪末之后的二百余年日本同中国的官方交往处于停顿状态。但同时，中国商船曾往日本，或进行贸易，或传递国书，日本文献载有宋神宗年间（一〇六八至一〇八六）宋商渡航日本者达二十余次。

十二世纪后半期，日本商船开始航渡中国，他们取道南路沿琉球群岛于回前进，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取道连接北九州的五岛列岛和杭州湾的舟山列岛这条航线。

日本船舶偶尔也漂流到朝鲜，大部分到济州岛，有的漂流到更北的全罗道楸子岛或古群山岛和忠清南道舒川郡的开也岛，更多的漂流是在从中国返航的归国途中。我认为漂流的原因或者因为恶劣的气候，或者因为风向和潮流的突然转变。

逆转循环的回流从渤海湾通过黄海一直伸展到台湾海峡。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七年之间日本科学家所进行的海流调查发现在朝鲜西海岸投下的一个标识瓶在七十九天内又回到原投下地点。

### （五）

扩大眼界来看，新安发现沉船的地点显然同朝中两国古时海上交通的南路有关。因此可以假定该船是由中国南部沿岸出发驶往高丽，在朝鲜西南海岸的深水处遇到风浪而沉没。现在的问题是这条遇难船只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打捞的六千余件器物大部分是陶瓷器和铜钱，那里发现的宋元时期的大型青瓷器物和铜钱是南宋和元代时期中日贸易的主要项目。当时还在元代政治控制下的高丽似乎不可能从江南地区输入这些商品，几乎没有什么文献或考古资料可以说明这些商品的输入。

也许有另外一种解释。即从中国驶往日本的一艘商船在新安海域失事，如前所述，曾有漂流到忠南海岸的日本船舶的事例。

从打捞的遗物中发现有三件高丽青瓷器，预料将会打捞到更多的朝鲜制品。那末，根据这些高丽遗物我们能否假定该商船曾中途在朝鲜停泊呢？

这种假设可以事实来说明。即发现沉船的地点是在蜿蜒于朝鲜西海岸许多列岛间的一条航路上。

从高丽时期到李朝时代政府征收的地方税米都由渡船运输，长期以来就是沿着这同一条海路行驶。这条海路也是日本遣唐使的北上航道。从朝鲜方面来说，它也形成了对日航道的一部分。打捞的船只是在距离这条海路只有四千米的地方发现的。

假定新安沉船驶往日本，只是中途在朝鲜的一个港口停泊，在其沉没之前进行某些交易之后继续南下，这似乎是非常合乎道理的。中途停泊朝鲜也许不是原来的计划，而是由于风向转变被迫如此。如果是这样，也许是漂流的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排除其原拟访问一个高丽港的可能性。

### （六）

沉船打捞完毕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切地说明其国籍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假设，即从下列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 （1）贸易史方面
- （2）船舶构造形式
- （3）船体和装箱用的木材产地
- （4）货物主人



### (5) 船员日用品

现在对这几方面作简要初步的解释。

(1) 满载中国商品的船只出航驶往日本。如果是朝鲜船，它就应该是在中国和日本间从事中间贸易的高丽商船，但是缺乏十三、十四世纪期间高丽船舶去到中国南部沿岸港口从事贸易活动的根据，无论在中国、朝鲜或日本的文献中都找不到此类中间贸易的资料。

(2) 推敲新安沉船的构造形式。造船专家、汉城大学工学院教授金在谨认为有可能是中国人建造的船舶，特别是舱壁构造特征更显出是中国形式。

(3) 船体和装箱用的木材产地的鉴定。发现的十余个木箱子中有些是用杉木材料制作，而杉木产自日本和中国南部，朝鲜并不生长杉木。

(4) 某些包装用器上刻有标记，有利于鉴别。有的箱子上划有“十”或“※”符号，有的用墨书写中国字“大吉”或“子显”。“大吉”正是表示吉利的愿望，“子显”被解释为货主的姓名，因为有些中国人取“子”为姓。打捞的铜钱上有“子厚”铭文，这也被认为是铜钱制造者的姓名。“子”姓人可能都住在中国南部沿岸。

(5) 发现的船员日用品尚未断定有船员个人的私有物。发现了公共使用的炊事用具，其中有一个木柄煎锅和一个显然是为过滤面条而用的笊篱。这些炊事用具同现在中国饭店中所使用的非常相似。

宋代中国商船携带国家发给的官方凭证航海。日本文献《朝野群载》(卷二十)中载有此种凭证的实例，船籍、船主兼船长和船员的姓名以及货物品名、数量和什具目录登记的一清二楚。在“防船家事”一栏中记有锣一面、鼓一面、旗五口。这次打捞的器物中就发现了一面锣，我猜测它就是沉船中“防船家事”的一种。

以上关于船籍问题从各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其结果表明它不可能是高丽船。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无疑是一艘中国船，从其装载的货物来分析，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它是元代的船只。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

## 新安海域陶瓷器编年考察

南朝鲜国立中央博物馆首席学艺研究官 郑良谟

### 概 观

一九七六和一九七七年在新安海域打捞陶瓷器共计六千四百六十三件，其中包括青瓷三千三百九十六件，青白瓷和白瓷(包括“枢府”器和粗白炆器)二千二百八十三件，黑褐釉瓷器(或天目釉)一百一十六件，钧窑系瓷器九十四件，其他各种陶瓷器五百七十四件。

大多数青瓷器都是龙泉窑产品，其中有些青瓷来自龙泉系产地，如丽水、庆元和云和等，大部分青白瓷和白瓷或许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有些青白瓷器大概是江西、浙江和福建等省制造的。白瓷似乎是由河北定窑和江西临川窑生产的。此外，还有一些来源未详的粗质白瓷。黑褐釉瓷器中有七件所谓的天目釉茶碗以及吉州窑产的各种壶碗，它们也许都是华南的产品。钧窑



系瓷器胎粗釉糙，与元代北方钧窑生产的瓷器不同，它们似乎是由受北方钧窑影响的南方窑生产的。除此之外，发现有四件白釉黑花器，其中之一被鉴定为吉州窑产品，其他三件被认为是磁州窑生产。但是，这三件也有可能是吉州窑的产品。因为吉州窑受到磁州窑的强烈影响。

## 编 年

### （一）概要

新安海域打捞的陶瓷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元代的产品，其余百分之十或属南宋时期或属南宋至元代初期的转变时期。

（1）从新安海域获得了数百公斤铜钱，目前尚未进行彻底的研究，但我们从中认出了“五铢钱”和“至大通宝”。前者从战国一直用到隋代，后者用于元代至大年间（一三〇八至一三一）。根据这一时间推测，我认为陶瓷遗物的下限当属十四世纪二十年代。

（2）在两千余件青白瓷和白瓷中没有发现一件青花瓷器。一般认为青花瓷器是在一三五一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开始生产，因为著名的“珀西瓦尔·戴维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大型青花瓷瓶就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生产的。大多数中国陶瓷专家似乎都同意青花瓷器是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生产的。新安海域陶瓷遗物中既未发现青花瓷器，也未发现釉里红瓷器。釉里红瓷器也象是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生产的。因此，新安海域的陶瓷器应是十四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或者最晚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生产的。

### （二）元代青瓷。

（1）有一件青瓷的器式和纹样显然同“珀西瓦尔·戴维基金会”收藏的著名的凸雕牡丹纹青瓷瓶相似。因为后者的款铭是泰定四年（一三二七），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新安海底的这件青瓷花瓶是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产品。

（2）有十件青瓷瓶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内蒙呼和浩特市郊发掘的龙泉窑青瓷瓶非常相似。因为同上述龙泉窑青瓷瓶一起在内蒙发现的还有一个钧窑香炉是一三〇九年（己酉年款）的产品，所以新安海域青瓷器不会晚于十四世纪二十年代。

（3）新安海域青瓷中还有一件阴刻花卉纹碟子，款铭为“使司帅公用”，据此可推定其时间为十三世纪晚期或十四世纪初期。

（4）新安海底遗物中的一件黑铁斑青瓷匜同北京崇文区龙潭湖元墓出土的一件青白匜在风格上相似，根据二者的相似风格来看，前者亦当属元代。

（5）新安青瓷中有十件大小不等的青瓷壶堪与日本称名寺收藏的一件莲叶青瓷壶（金泽贞显墓出土，卒于一三三三年左右）比美。这也是鉴定新安中国陶瓷年代的一个好线索。

我探讨了新安海底的中国青瓷，从质量、釉色、纹饰和底部的处理等方面来判断，这些青瓷器很象元代的产品。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是胎粗壁大、直口外反，釉色多为紫黄和紫绿，花纹繁缛，有阴刻、阳文、印花等。同精品混在一起的也有一些粗制品。宋代青瓷外表上的浮雕莲瓣纹似乎到后来变成了不太显著的阴刻纹。

### （三）元代青白瓷器

新安海域发现的青白瓷器大多为碗碟之类器物，但也有一些瓶、壶、枕和水注。碗碟一般为粗质，瓶壶为优质。

（1）新安海域的四件梅瓶中有两件同一九七二年在江西省万年县出土的元代影青狮子钮盖瓷瓶一样，由于后者的墓主人葬于一三二四年，该青白狮子瓶或许在一三二〇年初期制作，

考虑到该狮子瓶为景德镇窑生产(根据报告),我认为朝鲜的这两个梅瓶也许是一三二〇年初期的产品,也可能为景德镇窑生产。

(2)根据前述,有各类青白瓷和白瓷。这些陶瓷器中有数十件玉石般的白瓷,其釉光泽,其胎半透明。其装饰纹样有二:一是莲花或牡丹花卉纹,一是莲鱼纹。这两种纹饰完全同元代青花瓷器上的纹饰相同。可以推断,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是模仿白瓷的纹饰,而白瓷先于元代青花瓷器。

(3)新安海域发现的一件青白瓷瓶在风格上同江苏省青浦县出土的一件枢府窑瓶(一三三八至一三五五)极为相似,然而朝鲜发现的这件青白瓷比中国发现的那件要早。

新安海域的这件梅花纹青白瓷瓶处于从事白瓷器到枢府瓷器的转变阶段。它的侧面有贴花梅枝纹,两个长方形把耳位于颈部和肩部之间。青浦县出土的那件瓶子也有同样方形把耳,但因其器式更精致,即被定为枢府瓷,其时间应比前者稍晚。

(4)新安海域发现的许多施釉陶瓷器中有几件口沿特异的壶状器:有的肩部上带有四个把耳,有的则无。日本长崎县竹岛近海发现的一件四耳壶同新安发现的此种四耳壶属同一类型。我们知道蒙古人于一二八一年侵入竹岛时数千只船沉没在那里,因此可以证明在朝鲜和日本发现的这些壶一定是元代的。

(5)新安发现的金属器物中有一个秤锤,由于表面受到腐蚀,不知有无铭文,但从其形体来看,似亦是元代的東西。尤其是,这个秤锤同江苏省扬州市出土的铁权(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铭)非常相似。

就我提出的几例青白瓷和白瓷的推定年代而言,如前所叙,青白瓷碗和瓷碟都为粗胎,而且由于覆烧的原因,口缘均未施釉,而是以银、铜等金属镶边。但是大部分被腐蚀或剥落,大部纹样都是印出的花卉、龙或莲瓣,但看起来并不突出。这些瓷器的胎壁都很薄,足很小,有的通体施釉,有的将底部的釉擦掉。瓶、壶、枕或香炉都是质量很精的器物,并带有无釉的大足圈。就胎釉来说,这些阴刻纹瓷器的釉子一般都薄而透明,那些印花纹瓷器则釉色优美但厚而有气泡,略呈半透明。

枢府系白瓷为无釉大足,但并非覆烧,这些瓷器的釉色均呈浅蓝,通体为押印花纹,上述例(2)中的白瓷也许是青白瓷的进一步发展,如同玉器一样精致,其口缘无釉,但其小足精良且精心施釉,其押印花纹要比青白瓷碗碟上的纹样明显,且非常雅致而独特。

除上述几例外,也有一些产地不详的胎粗壁厚的灰乳色瓷器或硬质薄壁的淡黄色白瓷,其口缘无釉外反。这类瓷器全部是碗,碗的内底中央有阴刻花卉或中国字如“玉出昆山”、“寿山福海”和“福禄”等,这类瓷器在朝鲜也发现过。但它们同日本九州今津古墓群出土的一批瓷碗更为接近。这些青白瓷和白瓷大多数象是十四世纪初期的,只有三、四件被认为是十三世纪的。

金属器都是由青铜、银和锡制成,形体多样,有些器式同某种瓷器极为接近,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 (四)南宋风格器皿

三千多件青瓷中绝大多数是元代的,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被认为是南宋的,也有几件宋代瓷器同黑釉(天目釉)瓷、白釉黑花瓷和白瓷混在一起。

(1)有三、四十件南宋龙泉窑生产的优质碗、碟、瓶、花瓶和香炉(分别为粉青、梅子

青、砧青、油青、翠青），这些青釉瓷器同其他元代青瓷器在器式、胎骨、釉色、纹饰和足圈的加工方面均有所不同，它们的器式似乎有几分呆板，但显得端正优美。碗类均为直口，胎骨为灰色或灰白色，有的是浮雕露胎，少数为棕褐色无釉底，但大部分底部呈淡红褐色或淡褐色。釉子很厚，呈深海青或青色。纹饰简单朴素，有些碗碟外部为浮雕莲瓣，有些花瓶的把柄雕为鱼龙和凤凰状，有些碟子为贴花花卉。这些瓷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底部和足圈上的釉泥金被擦掉。

在新安海域这批遗物中发现南宋时期的这种优质浮雕秘色青瓷很有意义，它们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解释：

第一、龙泉秘色青瓷甚至到了元代(十三世纪初期)还受到很高的重视，并作为贸易瓷器装船外销。第二、从北宋开始生产到南宋达到盛期的龙泉秘色青瓷可能到了元代还在继续生产。第三，很有可能的是，龙泉瓷器的鼎盛时期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南宋，而是南宋末期和元代。

(2)新安海底遗物中还有约七、八件福建建窑生产的黑釉茶碗，其外反口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微弯，一种是曲折。胎骨黑色，免毫釉除了一个碗而外，所有建窑茶碗的反外口缘都属第一种形式。还有同第一种形式很相似的碗：一件是显德年(九五四至九五九)款的黑釉碗，另一件也是黑釉碗，是从张同夫妇墓出土(张同卒于一一九五年，夫人卒于一一九九年，同葬于一二〇〇年)的，从这几个例子来看，新安发现的建窑茶碗的时间晚也应为南宋。只有两个装在木箱子里的建窑碗保存完整(铜镶口缘)，其余碗的口缘全部残破，说明它们或许是由元代征集来的可能性。当然，认为建窑在元代按照早先瓷器的式样来继续生产也是可能的。

(3)此外，还有定窑系牡丹印纹白瓷大盘、官窑青瓷香炉和吉州窑黑釉白花唐草文小瓶。虽然这些陶瓷年代还不能确定，但同其他一般为多数专家认可的南宋陶瓷作一比较，他们也可归入南宋时代。以上讨论的是一些南宋时代的重要陶瓷样品。

新安海域遗物中同中国陶瓷器一起发现的还有三件十二世纪的高丽青瓷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些高丽青瓷和中国陶瓷对重新考察中国陶瓷史的编年问题颇有参考价值。

## 其 他

### (1) 同安窑青瓷问题

从宋到元，龙泉窑系的粗制青瓷在福建省同安县同安窑继续生产。而同安窑系青瓷(珠光青瓷)在日本大量发现，但在新安海域发现的中国陶瓷器中没有一例同安窑系青瓷、安溪窑青瓷同同安窑青瓷一起通过泉州港曾大量输往海外，但在新安的中国陶瓷器中也未发现安溪窑产品。

### (2) 同十四世纪高丽青瓷的关系

一般认为蒙古入侵影响到高丽青瓷的某些变化，而认为高丽青瓷也有可能对元代中国青瓷发生过影响。从十二世纪前半叶的几个例子来看，大部分十二、三世纪的高丽青瓷均无外反口缘，它们的口缘往往向内弯曲，从十二世纪下半叶以后，镶嵌青瓷在朝鲜最为流行，可是精致的唐草纹饰却很稀少。但是，在十三世纪晚期或十四世纪初期，外反口缘和精致的唐草纹饰的高丽青瓷大量出现。同时，新安海域的大部分青瓷都为外反口缘，其中有些纹饰为精致的花卉唐草纹。还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世纪时有些高丽青瓷的外侧面开始出现了浮雕线，与此有关的是，我们应该记得新安海域的许多青瓷器外表也有同类浮雕线。

(3) 在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现的中国陶瓷器大部分是青瓷、青白、白瓷、青花瓷、



褐斑青瓷、黑釉炆器和陶器，其中有许多同新安海域的陶瓷器相似。铁斑白瓷(青白瓷)以前在朝鲜或日本均未发现过，而在东南亚却发现了一些。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新安海域的陶瓷器中有四件同类铁斑白瓷。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

## 南 朝 鲜 出 土 的 宋 元 瓷 器

南朝鲜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 崔淳雨

众所周知，在韩国高丽时代的古墓中出土了各式各样宋元时期的中国陶瓷。汉城的中央博物馆蒐集了约一六〇〇件这样的陶瓷器，其他再没有更大的私人蒐集家来收藏中国的陶瓷器了。十九世纪晚期以来，许多中国陶瓷器从韩国流入日本，目前日本收藏的中国陶瓷器比韩国保留的要多好几倍。由于这么多的中国陶瓷器从韩国流出，所以要全面估价韩国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根据汉城中央博物馆的藏品和流散在韩国的那些瓷器，我们可提出以下的看法。

1、韩国出土的宋元中国陶瓷器中北宋时期为最多，从南宋到元代其数量骤减。为什么韩国出土的宋元陶瓷器如此之少，原因是从十二世纪开始高丽也生产了非常精致的陶瓷器，其技巧和造型都适合高丽人民的趣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因为大量生产，所以中国陶瓷器的输入自然而然地就减少了。

2、高丽古墓中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不仅仅限于宋元时期，实际上还有定窑和景德镇窑的白瓷以及耀州窑、汝窑、龙泉窑和磁州窑的青瓷，也有高丽瓷器、青瓷和金属工艺品。

3、除高丽古墓出土的宋元陶瓷器外，据笔者调查，尚有一九四〇年在开城高丽王宫满月台发现的北宋早期越州窑青瓷碎片和类似晚唐和五代时期的白瓷碎片，还有在忠靖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的一组遗物，其中有宋代早期越州窑的一个青瓷碟子。

4、为了考察方便，我们把南宋和元代加以区别。宋代早期，即公元第十世纪，当时的陶瓷器物还完全保持着晚唐和五代的风格，以致人们难以区别它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在扶余的扶苏山下发现的中国青瓷器物就是很好的例证，其越窑的奥秘釉色和堂堂的器式仍然保持着晚唐的风格，它们是同高丽时代早期的金属工艺品一起发现的，可以作为韩国出土的宋代早期陶瓷的代表作。

在十世纪的宋代白瓷中，我们经常发现类似唐代白瓷的样品，它们都是由粗糙的白瓷胎土施以白青釉在还原火焰中烧制而成。就碟子来说，足和外底均不施釉，此种类型被认为是十世纪和十一世纪高丽白瓷的变种。

5、北宋时期，北方系定窑的瓷器杰作是同青瓷一样的闻名，其釉和胎土都经过精心挑选。碗状器最多，其次是瓜形花瓶、香炉、酒器和碟子。

南方系杰作有景德镇窑白瓷和越州窑青瓷。一般来说，高丽陶工都是模仿定窑瓷器的形状和装饰题材，其烧造技术和釉调则受南方系的影响，它们甚至一律用还原焰烧制。

北宋的中国陶瓷器仅仅分布在朝鲜半岛中部以南，有许多是在京城开城地区出土的。一九三〇年代，笔者在黄海道海岸的龙媒岛进行了一次普查，这里以出土许多北宋白瓷而闻名。满山的古墓群被非法掘开。许多葬品已经被盗，但是仍然有许多定窑和景德镇窑的白瓷碎片同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高丽青瓷碎片一起散布在这个地区。龙媒岛是距离高丽王国京城不远的一处流配地，如上所述，韩国出土的许多北宋中国陶瓷，从其器式和精致的釉调和胎土来看，一般认为不是由私窑生产的。

6、南宋时期的陶瓷器同北宋时期定窑和景德镇窑的白瓷一样比青瓷占优势，但其质量均较北宋青瓷低下。同定窑系的官窑瓷器一起发现的还有一些私窑风格的白瓷，但我们不能确定其产地，发现的陶瓷器都由天然胎土制作并施有釉色，其中有些已经变形。这些器物均被认为是元代的贸易陶瓷，但无法予以证实。

7、当韩国输入北宋和南宋的中国陶瓷器时，他们总是选择最适合他们趣味的东西，这被韩国出土的宋代陶瓷一般反映了韩国人民的喜爱这一事实所证明。例如，韩国出土的器物在器式和装饰方面一般都相当简朴，那些卫生用具和窑变器物——钧窑和郊坛窑器物——很少发现。

但是，也出土了许多磁州窑生产的剥地纹和黑花纹以及定窑生产的天目釉精品。这就必然使人想起许多出土的精品都被弄到日本去的事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北宋定窑天目釉和河南天目釉除中国外任何国家都没有象在韩国发现的那样多。

8、韩国出土的元代中国陶瓷不如南宋陶瓷那样多。韩国没有发现一件南宋青瓷，但我们发现了几例元代龙泉窑青瓷，特别是民窑风格的白瓷和青瓷碗碟。不过，元代陶瓷和南宋陶瓷的编年尚未正确了解，所以长时期来都在期待着新资料的出现。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有些元代陶瓷可能包括在人们认为是南宋陶瓷之内。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编年来看，新安海底打捞的六千多件中国古瓷中包括了一些南宋瓷器，例如，许多不同形式的南宋黑釉和元代的青瓷和白瓷就包括在内。既然许多民窑系的白瓷和青瓷包括在此类之中，相信会为我们提供探讨南宋和元代陶瓷编年的重要资料。

被认为是中国商船的这艘沉船中仍有许多陶瓷器和其他文物。既然该船被认为是十三世纪上半叶沉没，而且该船如果被认为是商船，那么它能装载几个世纪生产的货物吗？随着这艘船只的发现，韩国变成了几个拥有大量元代中国陶瓷的国家之一，但是没有文献能够证明该船的目的地就是韩国。因为高丽当时是一个生产陶瓷的主要国家，它没有必要来输入这些相当粗糙的元代陶瓷。对这些陶瓷器的考察使我们相信，它们在类型、形式和装饰题材方面都同高丽古墓中出土的宋元中国器物有很大的不同。

# 木浦沉船发现的中国瓷器

## ——福州输出的早期元瓷研究

〔台湾〕陈庆光(音译)

自从去年发现一只载有数千件中国瓷器和几件朝鲜镶嵌青瓷的船只以来，对它的目的港即驶往朝鲜还是驶往日本的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我的文章将探索一下中朝两国之间的长期关系、船的始发港并附带讨论一下这些瓷器的年代问题。

为了确定该船是驶往朝鲜还是驶往日本，需要考察一下中、朝、日三国间在历史上的海路交通问题，也需要很好地了解一下三国间的文化关系。

沉船的位置确实在中、朝海上运输的南路和中、日海上运输的北路相遇的地方。

中、日之间的北路是从明州出发，经过中国东海岸，然后北至山东，横过渤海，沿着朝鲜西海岸，最后抵达九州。

自十二世纪末，日本同宋代中国的贸易日渐频繁。鉴于商业运输海上用具日益增长的需要，镰仓幕府要求宋朝工程师甄禾青(音译)建造船只，从此，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艺被引进了日本。

日本人经常驾驶着坚固的船只可以直接横渡海洋而无需担心他们的安全，十二世纪末叶以后他们往往取道南路。当时的中国人也沿着同一条路渡往日本。

另一方面，中、朝之间的南路从浙江明州出发，通过舟山群岛，沿江苏海岸，横渡东中国海，最后进入朝鲜海域，然后沿朝鲜西海岸北上至开城，船舶经常在群岛间于回行进，以免暴风雨的袭击，朱彧在其《萍州可谈》一书中称这条路为“南路”，徐兢《高丽图经》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宋元时期这条路比以前更为重要，主要原因是宋代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移到了华南。由于工商业经济繁荣，华南逐渐变成了中国的文化先进地区。

中朝之间的南海路在宋元时期逐渐成了华南和朝鲜之间的交通要道。

北宋时期，朝鲜使节经常取道“东路”，从开城出发，横渡渤海，或沿辽东半岛海岸抵达米州(即现在的胶州)，然后从陆地去汴京(即现在的开封)。至于朝鲜商人，他们也习惯于取道东路到明州。但是，北宋熙宁七年(公元一〇七四年)，情况有所改变，朝鲜要求一条新道，即通过明州沿大运河而汴京，最后到达汴京。



元丰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沿这条新路建有朝鲜旅店,元丰元年(公元一〇七九)和重和四年(公元一一二二)在明州建造供赴朝中国使节使用的船只,这些事实说明比以前更加重视南路了。

但是,当时同中国金代有敌对关系的南宋唯恐朝鲜人充当金代的间谍。朝鲜同金代建立过政治和文化关系,这一事实从咸镜北道的一座古墓发现物中可以得到证明,其中发现有“大定通宝”钱币。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中国同朝鲜的关系破裂,两国间不再派遣使节。尤其是,庆元时期(公元一一九五至一二〇〇年)制定了一条法律,禁止中国商人携带铜钱去朝鲜。南宋同朝鲜之间的官方关系虽然废除,但非官方的商业活动仍然沿着南路继续进行。

南宋灭亡后,许多人纠集一起组成海盗队,在朱庆(音译)和张训(音译)的指挥下对中国东海沿岸居民进行掠夺,一碰到元军,他们就逃驶朝鲜。一二八一年,庆元(宋代的明州)的一支拥有万人的元军受到日本的攻击,战争之后,也许是属于浙江江南部队的数万中国人停留在朝鲜。

从元代开始,不仅是海盗和海军使用南路。就是朱庆、张训和罗璧(音译)在其投元后也经过同一条海路从华南运米至大都。约在元贞元年(公元一二九五年),朝鲜连遭数年的严重饥荒,运往朝鲜的大米也是经由上述同一条海路。

一三一〇年扩张主义战争停止后,蒙古人便开始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朝鲜和中国都从战争的蹂躏中进行恢复,文化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南路又恢复到宋时那种繁荣的状况。朝鲜和中国的商船在海路航行把中国的文物运到朝鲜。元代文化的建立虽然归功于蒙古人,而事实上元代早期的文化仍然受到南宋的强烈影响。

元代早期,朝鲜人取道同一路线到华南考察文物,宋时的文物和有关的风俗习惯仍然受到朝鲜人的赞赏,例如饮茶就是北宋末和南宋在福建北部最为流行的一种习惯,这点在徐竞的《高丽图经》中已经谈及。朝鲜人最喜爱喝茶,其饮茶器皿如金纹黑釉(亦称天目)茶碗、青瓷小碗、仿定银火炉和煮水器,都是模仿中国的样式制造的。

朝鲜商人来到华南,然后带回中国的茶叶。有几件黑釉茶碗在朝鲜收藏着。

宋代以来,造船技术在浙江和福建大为发展,这就是宋元时期浙江的明州和福建的福州和泉州成为华南重要城市的原因之一。

宋元时期南路运输扩展到福州和泉州,有些航行到朝鲜并停留在那里的人绝大部分是福建人。

朝鲜人对这些中国人的特殊技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任用他们作为官员,有时还强行阻挡他们离开朝鲜。有些福建人留在朝鲜作官一生,也有些偶尔随着中国的使节又回到中国。

这一史料证明,宋元时期的中国文化传播到朝鲜。鉴于中、朝、日三国之间的海上运输航线,木浦沉船不可能驶往日本,它是从华南取道南路而驶抵朝鲜。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发现的瓷器产地及其输出的港口问题。

首先是釉色和饰纹问题,其次是倒装烧窑技术问题。

#### (1) 龙泉系青瓷

有各式各样器物:盖罐、匣、香炉、碗、碟、瓶等。这些都是龙泉系青瓷,其窑址包括浙江南部瓯江沿岸的龙泉、丽水、遂昌、云和和永嘉。宋时,青瓷的重要产地逐渐从瓯江下游移到上游。龙泉青瓷就是沿着松溪运到福建的泉州和福州,然后由几个国家的商船运往国外市场。

## (2)建窑瓷

这些瓷器中的第二系是建窑瓷。建窑系窑址不仅是建瓯县的水吉镇，而且还有光泽县的茅店以及崇安和福清的星村和玉林亭。虽然我们还不能清楚地鉴定这些产品，但这些窑址都位于福建北部。

## (3)景德镇窑

观音像为景德镇所制，影青、白釉、甚至仿钧釉亦为景德镇所生产。宋元时期，景德镇工仿造钧窑，特别喜欢仿造铜红釉。而且，仿造的青紫釉钧瓷在元代尤为普遍。因此，青紫釉三足盆或许是景德镇生产的仿钧瓷。如果这一推断可以被人们接受，那末华北禹州附近原来就生产三足盆了。

## (4)吉州窑

发现的器物中，赤褐色斑玩具，如人物和家畜都是吉州生产的。吉州器也包括彩系瓷，彩龙罐不会是磁州的产品，可能是磁州窑的仿制品，一直在吉州生产。

(5)福建有少数窑，例如闽清窑在元代时烧制褐釉瓷。不完全的考古记录不足以说明它的纹饰。根据现在所知，黄釉可能为崇安县仙店的毛元垅生产，而毛元垅是受景德镇影响的。

根据我们已经提及的窑址，可以提供一个结论：木浦沉船中发现的中国瓷器可能来自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江西。

此外，覆烧技术也可提供有助于我们清楚了解瓷器产地的资料。

覆烧技术首先为北宋定窑所创造，然后传到许多地区，如江西的景德镇和吉州、浙江南部的泰顺、以及福建的浦城等。

最后，我们要讨论一下编年问题，根据元代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我们可以把整个元代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从一三一〇年到一三四〇年，即所谓元代早期；一是从一三三〇年—一三五〇年，即所谓元代晚期，这两个时期完全不同。一三三〇至一三四〇的十年是元代艺术史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代之前，南宋的影响很深，从此之后，元代文化的风格逐渐发展。元代艺术的黄金时代在一三三〇至一三五〇年间。

元代晚期创造了各种工艺技能，例如青花和龙泉窑系在这一时期就很普遍，用覆装技术烧制的无釉口瓷被青花和晚期的龙泉窑系所代替。

这次发现中，铜钱的最晚年款是“至大通宝”（一三〇八至一三一—）。有几件花瓣青瓷瓶在造型和纹饰方面同一三二七年的戴维基金会收藏的青瓷瓶相似，这就导致我们相信，这几件器物可能是一三二〇至一三三〇年之间产生的。

木浦沉船中没有发现青花瓷器，虽然这方面仍需进行彻底的调查。但这说明木浦沉船是元代早期的，它或许从福州出发，这是因为各个窑址的瓷器都被转运到福建地区，然后由外国商船从泉州和福州再运往国外市场，元代的税局就设在泉州，商船为了逃税，往往从福州开航，沉船中没有发现位于泉州港口附近的同安窑瓷器。根据这一情况，木浦沉船的出发港当是福州。

本文只是提供一种设想，而不想作出结论，深入的研究工作有待人们进一步去做。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

# 台灣故宮博物院院藏瓷器 與新安海域發現瓷器之比較

〔台灣〕童依華(音譯)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除私人收藏家捐贈的以外，全是从滿州故宮弄來的。全部藏品于一九二五年集中北京后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原先，大多數宋、元瓷器是在養心殿、慈寧宮、古董房和永壽宮四處保存，故宮博物院成立時，宋元瓷器便陳列在御書房。

滿州奉天是滿人的故鄉，后来成为皇帝的避暑山庄，中華民國成立后，所有文物便从奉天搬到北京。在紫禁城里兴建了宝蕴楼收藏这些文物。后来从中挑选出一些珍品陈列在文华殿和武英殿。

当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威胁着北京的时候，大部文物装箱由船南运至上海、南京，战争期间，为了安全起见，又把这些文物搬至西南内地。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间，这些文物又搬回南京，到中国共产党人接收中国大陆以前运至台湾。全部瓷器有二万三千六百八十六件，是世界上数量最多质量最佳的瓷器藏品。

在这二万三千多件瓷器中，有些器物与朝鲜海底发现的瓷器式样相类似。今天我的文章将集中谈谈这个问题。根据目录看，沉船内瓷器一般来自中国南方，诸如浙江省的龙泉窑、福建省的建窑、江西省的吉州窑和青白瓷之类。一般说来，青白瓷被认为是釉下兰前身。青白瓷的特点是纯白、高岭土胎、半透明白青釉，削足方正。

一个小附属物把器嘴和器颈联结在一起，状如蝌蚪，它同器体另一边的形状把柄相适应。器物带有少量粘泥制作的小附件在这一时期已成期已成为普通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够断定这只沉船的年代是十四世纪前二十五年。那么它必定是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前五十年期间派遣出去的。元代使中国置于一种新的异族统治之下。其结果是政治制度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汉人在政府中失了地位，强大的压迫控制着人民，文人学者的地位下降了，不再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在瓷器生产中失去了宋代风格的原因。

有一种器物的形体争论了许多年，器体为碗状，下部雕有莲瓣图案。肩部饰有五个小管，器口外翻，状如蘑菇。整个器物涂抹一层铁灰色的半透明薄釉，釉子聚集处色彩较暗，口沿脊部灰白胎外露。整个说来，釉较薄。

从早期的越窑瓷器可以探索这件器物的渊源，越窑的器体较长而口部涂箔。这件越窑瓷刻有一〇八〇(神宗元丰三年)款。但是在清代复制时其形式已有变化，不过仍能看到圆形胎体，四个小管和主咀是象征祭天的五岳。

用鱼作装饰，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便已有之。在商代，鱼是用作中国青铜器上的饰纹，玉器也雕为鱼形。在汉代，鱼是水器的主要图案。

到了六朝时期，有些水器鱼纹是从青铜器上仿制下来后刻在器体上的。南宋时期，鱼纹大都涂在釉下，以后逐渐发展为另一种所谓防蚀剂的新技术，这种防腐剂就涂在素瓷的釉上。